

朱学勤

Zhu Xueqin

著

风声·雨声·读书声

FENGSHENGYUSHENGDUSHUSHENG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朱学勤

Zhu Xueqin

著

风声·雨声·读书声

FENGSHENGYUSHENGDUSHUSHENG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声·雨声·读书声/朱学勤著.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4.9 (2003.8重印)

ISBN 7-108-00724-X

I. 风… II. 朱… III. ①随笔-中国-现代-选集
②杂文-中国-现代-选集③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120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陆 泉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 数 150 千字

定 价 11.00 元

自序

问学十年，聚散离合；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在这本小集得以出版之际，我不能忘怀我的三位导师：硕士导师何汝璧、博士导师金重远、博士答辩主持人王元化。在我艰难困厄的时刻，他们接纳了我，保护过我。

同时，我也应该感谢诸多读者朋友。他们多是一些素不相识者。我只能从来信中知道人心未死，还有那么多善良的目光在互相关注、互相叮嘱。

文章历时逾十年。写作时，不曾为今日留有余地，故而随兴所至，分散漫漶，以致今日结集出版，如何想一个集名，反成了一个问题。几番斟酌，还是无奈，只能从少年时代默记于心的那首对联中截出半句——“风声、雨声、读书声”，移作集名，似乎只有这三种声音，能够呼应这十

年我内心不断回响着的另一种声音。

我服膺梁漱溟先生所言，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种人——学术中人与问题中人。我永远敬重前一种人，本身却受性情局限，大概只适宜作后一种人。所谓“问题意识”，我这一代人多发轫于文革后期，先觉者觉醒于1968年的思潮辩论，后觉者也不会晚于1971年的9·13事件。那时，我们曾以贫弱的学力、旺盛的体力，在私人场合热烈争辩那些激动人心的问题。我后来选择文科院校以及思想史专业，更多的动力也是来自“问题意识”的驱动，而不仅仅是单一的学术兴趣。以“1968”命名的这一代人，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只有少数人侥幸走进了文科院校。即便如此，后一部分人中愿意兼顾学理与“问题”，同时并进者，也不多了。每念及此，内心不胜苍凉：当年以非知识分子身份，思考正常环境下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思考的问题，当然是历史的扭曲，但也锤打出这一代人的思想生命；如果在获得了知识分子身份之后，直奔学术前程，放弃了当年的“问题意识”，岂不是买椟还珠，堪称一代人的思想悲剧？

问题不在于“问题”。当年那些“问题”都会发生变化，也应该变化。但是，面对现实，坚持

追问，这样的“问题意识”却不应该放弃。我试图拖着“问题意识”在学术环境中行走，既要发展，又要自我批判，走了十年，确很吃力，也吃了一些苦头，但确也有一点收获。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可以说，是十年磨炼尚未修成正果的涩果：既有坐冷板凳写出的学术论文，也有破门而出的各种议论。论文从潘恩开始，经过卢梭、顾准，还有新儒家，反映了我在学理层面的思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其间有自我淘洗，淘洗这一代人精神生命的思想线索。至于各种议论，以书评为主，则是另一类文字。如果说学术论文写作时，我必须克制自己，那么后一类文字则较多感情色彩：“笑着的”，“叫着的”，还有“哭着的”。如“随风飘去”，文字虽短，包含的苦闷、愤懑却很浓重。那是一种“悲愤中的笑”，只有特殊的氛围，才会产生那样特殊的面容、特殊的文字。“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则是“叫着的”文字，当时年轻气也盛，曾痛痛快快地叫了几声。至于“地狱中的思考”，从题名可以想见写作时的心态：既哭悼顾准先生之早逝，亦写出近些年面对虚无主义思潮，我对另一种情怀的怀念。那样的情怀，那样的知识分子，不会有好报，得到的总是“迟到

的理解”。然而我深信，他们是生活中的“盐”，永远不会过时。

生于这样的时代，不会有好心情。少年时代默记的那半句对联，成为我人到中年的文章集名，这就是宿命。是喜，是忧，已无从说起，只想问：是否还有同道者，还在世间怀念那首对联？如有之，且让我们再一次拍栏吟诵——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谨以此，敬献我的读者。

朱 学 勤

一九九三、十二、十

目 录

1	自序
1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13	为学不作媚时语 ——读王元化《传统与反传统》
17	是社会批判，还是政治参与？ ——关于张闻天的悲剧与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问答录
34	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
52	随风飘去 ——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56	毛泽东和他的民粹主义 倾向 ——与施拉姆教授的对话
73	毛泽东晚年文化思想散 论
92	六十年代的教育危机与 八十年代的语言破译
103	为什么要对比研究文化 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120	启蒙三题：笑着的、叫着 的、哭着的
134	两个世界的英雄——托 马斯·潘恩
165	托马斯·潘恩在近代政 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193	让·雅克·卢梭和他的 恋母情结 ——兼论某种文化现象
213	教士与帝国一致的制度 ——卢梭政治哲学评析
255	老肉圣开不出新外王

——新儒家政治哲学评析

286 迟到的理解

299 地狱里的思考

——读顾准思想手记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
内心不自由的惩罚。

——马克思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

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岂止从今日开始？

1986年8月一个炎热的夜晚，巴金提笔祭奠自己的亡友——胡风。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颤巍巍地说：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

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1955年的事。”（巴金：《随想录·无题集》）

1955年发生了什么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把另一个知识分子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提供给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制作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第一批材料。接着，政府查抄胡风私宅，把更多的私人通信公之于众，并且分门别类，加上按语，抛出所谓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然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一哄而起纷纷“向井口投掷石块”（巴金语），争先恐后地在那家报纸或其他报纸上发表讨伐胡风的文章，咬牙切齿，声声可闻。那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都辑录在《人民日报》上。翻一翻这家报纸1955年5月至6月的合订本，后代人既为那三批按语无限上纲罗织文网的强横逻辑而震惊，也为当时知识分子同类相残的可耻记录感到羞耻。请看这些文字：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

“我看穿了胡风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子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

“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要彻底消灭这批狼种”。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上述语言的作者，既有刚殒落不久的一代文坛巨擘，也有至今还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既有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山药蛋作家，也有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当然，也少不了后来被称之为反革命文痞的姚文元。然而，在这么些文字中，后来的读者能猜得出哪一句是出自姚文元之口吗？你拣最丑恶的猜，也会猜错。

悲剧不在于谁比谁丑恶，而在于后来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伤害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殉道者时，竟使用起同一类语言！

人常说，那三批按语是后来一切整人哲学、整人语言的开始，但是忘了补充一句：围绕三批按语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后来街头大字报语言的开始。这类文章，尤其是这类文章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与日后红卫兵的语言、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差别呢？“狼种”、“狐狸”、“九尾狐”、“彻底消灭”、“严厉镇压”，三十年后，红卫兵毫不犹豫地代之以“牛鬼”、“狗崽”、“炮轰”、“砸烂”！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区别在于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灾难过后，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一代文化巨擘，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土，受过系

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这不是文明人使用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当红卫兵忏悔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忏悔，甚至更应该忏悔！因为他们当时就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不是出自野蛮，就是出自虚伪，因而，也就更应该承担良心上的责任。

“狼种”、“九尾狐”、“灰蛇”、“白蛇”——一场真正的理论冲突和政治悲剧就是被这种几乎是村妇相诤的语言辱没了，冲淡了，冲淡成丑剧；然后，再向外蔓延，越出胡风事件的个人范围，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足够污染几十年文化氛围的空间内收敛还原，还原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悲剧。当后一代人重读那三批“按语”和那一批文章时，将难以抑止内心泛起的强烈的厌恶之情。人们甚至会这样说，连“丑恶”都可以分出档次：那三批“按语”虽然强横，却还留有强横者的气势，强横者的文采，尚可称“恶而不丑”；而一批助恶帮闲的文章呢？则落入更低一个阶次。它们虚假到了极点，也虚弱到了极点，助恶无作恶之“力”，助恶无作恶之“美”，只能称为“丑而不恶”！需

要付出多么沉重的心理代价，后代人才能相信这就是我们中国唯一受过民主教育的那个阶层在当时使用的语言？等到这个阶层都已习惯于使用这类语言时，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费希特有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中国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就是这样开始的。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一场接一场如雪崩般发生。整个社会像被人在山巅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滚动，直到最后滚入教育、文化、伦理乃至文明规范的崩溃深渊。从这类灾难中过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都已学会如何控诉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但从五十年代中叶那次可耻的投降以来，他们哪一天不是在虔诚地等待这一切，召唤这一切，甚至参与制作这一切呢？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五五年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落网；五七年漏网偷生者，六六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会有人说，这是违心的，那是被迫的，请

宽恕知识分子们在高压下的不光彩行为。即以胡风为例，他们承受的政治压力再高，也高不过胡风身为囚徒在监狱中的生死压力。一九六六年夏，胡风尚在服刑。官方来人要他揭发周扬问题，威逼兼利诱。人们都知道胡风与周扬宿怨已久，其锒铛入狱的悲惨遭遇与周扬不无关系。此时胡风揭发周扬，无论如何都不为过；此时胡风不揭发周扬，则可能加重刑期，甚至被推向极刑。是报复宿敌，以求获得“正当”的自由？还是顶着压力，甘冒生死之祸，保全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胡风的态度是：

“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梅志：《胡风传》载文汇月刊 87 年 9 月号）

一个囚徒在生死关头作出的回答，将使无数养尊处优者的所谓“违心之论”无地自容。这个囚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这里才重放异彩。在